

## 第一编

# 地区主义历史与观念探讨

# 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

肖欢容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 有关地区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

国内学术界很少使用“地区主义”一词，直到现在，相当多的研究中使用的是“世界经济区域化或集团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地区一体化”等不同的语汇来表示同样的概念。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特别是中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后，“地区主义”一词才渐入中国学术界的文献中。<sup>①</sup>因此，要理解地区主义，对“地区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一番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笔者认为，地区主义总体上是一种趋势，一种强化各种联系的趋势。这种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指一个地区多样化的共同特性，另一方面是指一个地区强化共同特性的趋势。具体地说，地区主义是指功能领域里的政治合作，是国家有意识的政治决策的形成。它常常是一群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为了发展它们共同

相关的论述可参阅：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欧洲》1999年第2期。

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与目标所进行的互动与合作。地区主义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制度的构建，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秩序安排，是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战略方面联合管理它们的地区事务。<sup>①</sup>

对地区主义的注意，反映了国际关系中多边合作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但是，特定的国家并不必然地走向地区主义。地区主义建构需要一定的条件。笔者认为，这些条件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是成员国共同意识的形成。地区主义是由一群国家所形成。这些国家常常认同地区的地理空间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文化的相似性或者相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威胁观念和共同的政治体系与价值等方面将使这些国家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识或共同体感。成员国共同意识是地区主义多样化的共同身份特性的内质。

其次，成员国共同制度化框架的形成。为了促进地区主义，需要有一种实现共同行动的制度化框架。这种框架可以提供成员国赖以沟通信息、增进理解的机会。同时，它也可以减少每一成员国制定切实对外政策的交易成本。共同的制度化框架是地区主义多样化共同特性的外在体现。制度化框架的实体是组织，最终，地区主义共同特性常常是通过正式的地区组织来体现的。约瑟夫·奈就认为，地区主义是“地区基础上形成的组织”。<sup>②</sup>地区组织构建是现代地区主义的基本层面，而制度的建设是地区主义的核心，缺少它将被看作缺少地区主义。

最后是成员国共同行为取向的形成。共同意识和共同制度化框架将促使成员国的行为趋同。这些共同行为取向将使成员国形成对

① 地区主义的定义很多，而且常常有争议，国外最新的有关地区主义观念的讨论，可参阅：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7—73; Peter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1, no.2 (1996), pp.123—159.

② Joseph Nye,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ism* (Boston: Little Brow and Co., 1968), p. xii.

地区主义外部的一致政策决策，增加成员国对外部的权势。通过地区内成员国有别于外部地区的政策和行为，强化地区主义共同特性。这种强化的实践常常是通过构建各种类型的地区组织或者地区一体化安排来实现的。就地区主义上述三个条件来说，成员国共同行为取向将提高制度化框架的演进和共同地区身份特性（包括共同意识）。这种循环逐渐增强地区主义。总体上说，地区主义上述三个条件之间是相互促进的。

地区主义一旦形成，它的作用就体现在地区性组织和特惠的贸易安排即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方面。在政治方面，一般认为，通过各种类型的地区性组织的构建及其实践，地区主义有助于国际和地区间的和平与稳定。但地区联盟的这种作用是存在很大片面性的。在冷战时期，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军事同盟体系置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方式之上，制约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在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积极谋求失去华约这个对手后继续存在下去的合法基础。北约提出的战略新概念及其实践（对南联盟的干涉），是对联合国的普遍性安全机制和世界新秩序的构建的严重挑战。其程度比冷战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地区成员国通过特惠的共同安排，可以增强地区实力，加强地区与地区外部的国家或组织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权势（*bargaining power*）。但地区主义的这种作用对国家主权产生了挑战。任何形式的一体化都将伴随着失去主权。因为一旦国家经济某些部分自由化（如贸易），该国不再对该特定领域有决策权。如欧盟为实现一定目标，有意识地在特定领域将主权从民族国家拿走，将之置于超国家机构手中。这些目标大的如政治统一，对主权要求小一些的如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在 *NAFTA* 中也可看到）。而且，更强调政治的一体化比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将对国家主权有更多侵蚀。

尽管地区主义对国际社会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产生了重大的制约和挑战，而且上述作用和挑战仍将伴随着地区主义的发展，但

地区主义发展表明对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地区主义的战后发展经历了旧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两个阶段。

## 旧地区主义

20 世纪初期以来，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主要关注就是如何建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地区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争论。一战结束时，在普世主义的观念基础上建立了国际联盟。但国际联盟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失败导致了地区主义观点的迅速高涨。二战后期，在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建设方法上，地区主义与普世主义之间产生了更多争论。<sup>①</sup>

1945 年以后地区组织快速增长就是在地区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争论背景下发生的。在旧金山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时候，赞同地区主义的力量多方要求在这个普遍性框架下容纳地区组织。丘吉尔首先赞同通过地区主义而非普世主义求得世界秩序。拉美国家组成的地区主义者认为地区组织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和平、安全和福祉的目标，因而强烈要求给地区组织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合法地位。最后，普世主义者同意妥协，给地区性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以从属的作用。<sup>②</sup> 联合国框架下地区组织的作用确立了地区主义国际作用的合法性，为后来地区组织在经济社会方面作用的发展和地区意识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二战后地区组织的发展主要有三种形式，即综合性地区组织、地区军事联盟和功能性组织。综合性地区组织是其广泛的行动和目标跨过政治军事和经济社会这种两分法界线的地区组织。军事联盟

① 争论的有关方面可参阅：A. LeRoy Bennet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rinciples and Issues*, 5th edition. ( Englewood Cliffs, N.J. . . Prentice - hall, Inc. . . 1991 ), pp.218—221.

② Francis W. Wilcox, *Regionalism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XIX (Summer 1965). pp.789—811.

型组织是指那些以军事政治为中心定位，提供反对外部行为者的安全性组织。功能性组织是那些提供经济、社会和政治合作，不涉及或较少涉及安全因素的组织。

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地区主义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体现在其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维护上，特别是对美洲国家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这三个主要的综合性地区组织中。这些组织的新兴国家发现：地区主义有利于他们避免遭受大国对其主权和自治权的干预。同时，地区主义也是它们实现共同经济和政治互信的方法。特别是当大部分亚洲、非洲和中东国家仍然处在殖民统治下时，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联盟更多是国家独立的工具而非地区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恪守联合国不干涉国家内部事物的神圣原则，在解决地区内部国家间冲突、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最大的一类地区性组织是功能性组织。正如前文指出的，它们是为了提高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里的合作。这种功能性组织的产生也是来源于政治安全的大背景。如典型的功能性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它的经济一体化即根源于广泛的安全框架。正如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序文所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构建是克服古老的权势竞争，通过建立一个经济共同体，去创立一个广泛的和更深的、长久以来被流血冲突分裂的人们共同体。<sup>①</sup>它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建构过程，在其中经济一体化逐渐扩展和深化。第三类地区性组织是地区军事联盟。所有的这类组织都是冷战的反应。它一方面来源于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华沙条约组织），另一方面是美国领导的所谓的自由世界（典型的是北约）。孕育这类组织的根源是国家间的不信任和敌对而非友好和合作，通过建立军事同盟，来保护成员国免遭外部侵略。

这一时期的地区主义经历了战后初期的主要关注和平与安全的

<sup>①</sup> William Wallace, "Regionalism in Europe: Model or Exception?" in Fawcett and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Order*, p.209.

综合性地区性组织和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军事安排，到 20 世纪 60 年代伴随欧洲一体化而来的功能性地区组织。其主要体现是吸收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探求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主权国家的联合和合作。这种联合和合作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限制，是一种囿于主权的地区主义。它们尽管方式各异，但都是地区主义在战后初期国际背景的体现，都是从地区主义的秩序观点，从和平与安全出发来构建组织的主旨。

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两极的多极化趋势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国际政治的关注逐渐从高级政治转向低级政治，地区主义者的兴趣从冲突控制的和平与安全事务转向经济社会事务。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组织衰落了。如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联盟。但同时出现了次地区性安全框架。如东南亚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和孔得多拉集团等组织。这些组织的目标之一，像它们的先行者一样，是控制冲突。但这些组织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为显著。正是这些次地区性框架功能关注重心的改变和以欧共体为典型的功能性组织的不断演进，强化了地区主义在多边主义中的地位，将地区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即新地区主义阶段。

### 新地区主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在实现国家经济目标的方式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共存。<sup>①</sup>正是在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两种实现世界经济方式争论的背

① 有关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的争论，可以参阅：Jagdish Bhagwati,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the Wrong Road* in *Law &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27, no.4. (1996) pp.865—871；Jagdish Bhagwati & Arvind Panagariya, *Preferential Trading Areas & Mutilateralism - Strangers, Friends or Fees?* in Jagdish Bhagwati & Arvind Panagariya, *The Economics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Washing: AEI Press, 1996) .

景下，80年代后期开始，地区主义在沉寂了十多年后又复兴了。

三方面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促使了新地区主义的兴起。首先是80年代中期的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中对多边主义的更多考虑。其重要的体现是在80年代中后期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第一阶段中，欧洲国家扩大努力，要求在1993年初创建统一的欧洲市场。欧洲一体化的这种深化努力，促使其他地区和国家选择战略性对策措施，创建它们本身的地区经济组织或者加入现有的地区经济集团。在这种新地区主义潮流下，90年代初期，有关地区一体化的协定急剧增长。据世界贸易组织报道，从官贸组织成立到1994年末，有109个地区经济一体化安排，其中有33个是1990年到1994年间创立的。<sup>①</sup>

其次，新地区主义的出现与美国对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政策态度的改变也有关系。美国传统上是多边主义的保护人。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欧洲通过深化和扩展一体化进程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时，美国对地区主义的兴趣也日益增长。1989年美国与加拿大合作后到1994年加上墨西哥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美国地区主义政策的一个支柱。随即，它又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再次，随着冷战的结束，代替意识形态的认同，复活了国际关系空间认同的重要性，这也是新地区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前所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地区主义是在和平与安全的背景下寻求秩序的地区主义，它遵从联合国宪章，以不干预国家主权为圭臬，是一种限于主权的地区主义。而80年代以来的新地区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造反。它是国家面对全球化的一种积极反应和策略。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跨国力量的迅速发展，一些民族国家对民族经济的调控能力下降，不能有效地对付全球范围内跨国关系的各种挑战，结果导致一些国家走向地区层

<sup>①</sup> 数据资料来源：WTO, *Regionalism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Geneva, 1995)

次的各种政治协调或经济安排，以增强单个国家对外部世界讨价还价的权力。

除了上述的时代背景使民族国家的地区主义考虑与旧地区主义不同外，笔者认为，新地区主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首先，与冷战初期相比，地区主义不再局限于相当狭隘的安全和经济目标。它所关注的内容和要求实现的目标不断地增加，涉及建立在地区基础上包括人权、民主、环境和社会正义的跨国社会和文化网络等方面。随着内容和目标的增加与扩展，它体现了对国家内部事务的介入性。这种介入性体现在两种形式的实践上。第一种形式是北约和欧盟，打着市场资本主义、“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旗号，给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以成员国的身份，使东欧加入西方。这些东欧国家，将接受由北约和欧盟制定的、较少受主权约束的地区行为规则。西方欧盟和北约的扩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如何在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重构自己的地区认同和身份特性，这是关系到其组织制度构建的重大问题。

第二种是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为了对付未来可能的危机，开始采取一些干预成员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如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泰国外交部长提出的“灵活接触”政策就体现了这一趋向。面对更加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趋势，两种形式的地区主义都会更多地介入成员国内部事务。

其次，新地区主义体现了当今世界霸主的美国试图控制地区主义的战略实践。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在想办法克服地区主义进一步分散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追求一个双轨战略来平衡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美国寻求双轨战略的具体方式是通过建立机制来制约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欧洲通过单一欧洲法案计划，1993 年成立欧洲共同市场，美国都表示了对欧洲“壁垒”的关注）。美国的实践战略是使用亚佩克作为武器克服地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亚佩克的基

础。从战略层面看，美国以人道主义干预使命为幌子，强制推行北约的“战略新概念”。其目的是在冷战结束后，使失去对手（华约）的北约继续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战略。

美国的上述地区一体化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产生了重大挑战。当前明显的体现是在拉美和东亚。正如上文指出，面对全球地区主义的各种安排，美国采取双轨战略以控制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在亚太，美国提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亚佩克发展的基础。比亚太开放的地区主义战略更早，在美洲，美国 1994 年提出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构想。美国的这些战略计划，对两地区业已存在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的身份和认同特性带来混乱。更为具体的问题在于：在谈判规则程序及规则内容制定方面，美国处于强势地位；在解决发展差异性方面，如墨西哥，为便利美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入美国市场付出了大代价；在发展目标方面，相当一些发展中国家目标仍然是消除贫困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要融入发展程度更高的体系是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第三，新地区主义具有明显的自我伸张性。与旧地区主义不同，新地区主义不再甘心屈从于联合国框架之下，希望取得与联合国平等的地位。当前的地区主义的各种实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全球化潮流，应付危机的偏离主权的趋向，还是西方国家优势权势体系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的全球扩展，都体现了地区主义本身的各种形式的扩张性。地区主义的这种扩张，必然对未来国际秩序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第四，新地区主义的全球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板块性。在冷战时代，地区主义存在强烈的和平与安全背景考虑，它鲜明地体现在综合性地区组织、地区军事联盟和功能性地区组织三种类型的地区组织中。新地区主义除上述三方面特征外，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使它的发展展示出区域地理经济特征。这种特征的体现是当前世界经济以三个地区经济组织为主体呈现三大板块。即欧洲板块（欧洲经济共同体）、美洲板块（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

板块（日本和东盟）。<sup>①</sup>以这三大板块为主体存在许多次一级的地区主义框架。如美洲的拉丁美洲南部共同市场，与欧洲紧密联系的非洲一些区域经济集团等。

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地区主义仍在强劲地发展着。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它将会不断地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向。而对于新地区主义的各种理论与实践研究，也将会不断加强。

## 地区主义与中国

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和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国到20世纪90年代才成为发展并不成熟的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在冷战时代，由于我国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导致我国对地区性组织主要是持一种观望和防范的态度。自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的改革开放，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背景下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我国与地区性组织的关系问题紧迫地摆在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前。

尽管我国已经成为范围较广泛的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国，但在对外战略方面的滞后造成具体实践中的诸多不足。所以，笔者认为对我国与地区主义关系的思考，应该纳入到我国的对外战略中去。当前有关我国的对外战略的思考很多。<sup>②</sup>但笔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发展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首要战略，其他战略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在发展这一大战略的前提下，我国与地区主义的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笔者认为下面三方面的思考是很重要的。

首先是对日关系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地区主义浪潮冲击面前，我国如何立足东亚，走向世界，成为具真正世界性影响的大

<sup>①</sup> 地区主义三大板块的观点是作者根据王逸舟先生授课讲稿整理而成。

<sup>②</sup> 王逸舟先生对此就有较好的思考，参阅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 312—330，383—384 页。

国，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由于中日历史问题的存在，加上双方对美关系的考虑，使中日关系总是处于低迷状态。中日关系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必须纳入到发展战略，纳入到中国与东亚地区主义的思考中去。在这方面，历代世仇的法国与德国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次是东亚安全框架的构建问题。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在报刊上纷纷撰文探讨东亚安全框架构建，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考。但这些思考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忽视。笔者认为，美国可以探讨，因为任何安全框架的有效性几乎都涉及美国。而任何新的设想与实践，都可能成为美国撇开联合国的又一次尝试。这一问题的思考，实质上是我们对地区主义与普世主义的关系在我国对外战略中如何定位的问题。所以，如果联合国的安全机制在东亚仍发挥作用，东亚就不必要新的机制。如果不能，我们就必须主动参与而且要争取主导地位。

再次是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将地区主义与世贸组织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在我国对外战略中如何定位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前美国的霸权实质上是依赖于地区主义来行使的。在经济层面，美国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依托，参与世界经济竞争，而且，提出美洲自由贸易计划和亚佩克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美国的地区主义战略。在政治方面，美国强力推行北约新概念来实现其对外战略。因此，我国要在世界经济权势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必须思考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这两个我们不熟悉的且具战略性的领域。当前我国面临着“人世”，这一思考就更显得十分急迫。

### 结语：地区主义的未来

地区主义在战后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寻求和平与安全背景下关注主权的维护和秩序的构建到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利益的方式的转变

过程。这一过程是从囿于主权的地区主义到偏离主权的介入性地区主义的过程。新地区主义的这种对主权的介入性趋势还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地区主义的前景怎样，它将成为多边主义的助力还是阻力及其与全球秩序的关系如何？这都是必须探讨的现实问题。依笔者的观点，这赖于三方面问题的解决。

首先，一个国家并不是必然地参与地区主义。在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它自然地要关注相对获益而不仅仅满足于绝对获益。这就要求解决地区主义内部及地区主义之间的平衡发展问题。其次，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与占优势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前即是如何对待美国的地区主义战略这一主题。最后是地区主义如何促进多边主义以及从经济的一体化如何过渡到普世主义的世界秩序层面。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仍然是地区主义本身认同特性的构建及其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今后地区主义的前景依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 “新地区主义”研究

## ——不同视角的评析

耿协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先声夺人，全球化的种种力量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走向一体化。学者们开始把“全球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中的理论形态加以探讨，再也不像当年“罗马俱乐部”提出“全球性总问题”时把它视为杞人忧天的呓语了。不论是鼓与呼还是嘲与恶，“全球化”和“全球主义”都无可改变地进入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大门类，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各个流派、各个层面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又看到，伴随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还发生着另外一些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历史趋势，那就是“分裂化”或“分散化”的趋势，具体体现为两大方面：一是民族主义的复兴，包括受经济全球化影响而强劲发展的“经济民族主义”、冷战格局解体所释放出来的政治上的“民族分离主义”，以及由传统文化复兴和本土文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抗拒等所导致的“文化民族主义”等等；二是地区主义的新发展，特别是世界经济以地区为中心聚合发展而导致的“经济地区主义”新浪潮。对“民族主义的复兴”，国际理论界已经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讨，而对“新地区主义”的关注则明显不够，经常停留在现象描述和历史追踪的阶段，进行深入思

考、加以条分缕析的成果也有，但更多的是从不同学科的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尤其是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经济地区主义”在欧美已经形成一次成就可观的研究新潮。<sup>①</sup>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经济地区主义”，或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成果鲜见。不过我们看到，受经济地区主义浪潮的推动，国际关系中的地缘主义（Geoism）和块化（segmentation）思想以各种形式再现生机——地缘政治这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被重新加以阐发、引申和应用，而地缘经济学也开始有人予以重视。可以说，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前景。

为了更好地理解地区主义这一新兴的课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迄今为止国际理论界研究新地区主义的三种最常见的观察视角或方法，即历史的、规范的和比较的方法及其观察结果，作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比较和总结，以期引起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更大关注，也期望为任何关心这一新话题的人们提供一副有用的观察镜。

## 一、历史的眼光

国际理论界首先从认识历史发展潮流的立场出发，试图给予地区主义这一冷战后的重大国际现象以尽量客观、公正的描述和定性。众所周知，在1986年前后，欧洲共同体讨论并通过“单一欧洲法案”的时候，学术界就迅速掀起了复兴“地区主义”研究的热潮。及至冷战结束之际，地区一体化的实践活动从欧美扩展到“第三世界”，终于大大丰富了国际学术界对地区主义进行描述和历史研究的内容和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探究地区主义浪潮的著作，主要涉及这样三大问题：一是地区主义的发生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二是新一波地区主

<sup>①</sup>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 3, Summer 1999.

义的根源和意义是什么？三是当代新地区主义能够持续生存下去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些人的回答十分干脆，认为地区主义“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的世界历史上，并没有过这种现象；”<sup>①</sup>“迄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地区主义尚未进入国际关系的语境。”<sup>②</sup>这种看法目前最为流行。但也有不同观点，比如美国国际经济学界有人以国际贸易为中心研究新地区主义时提出：“最初的地区主义事件发生于 19 世纪的后半期，并且主要是一种欧洲现象。”<sup>③</sup>另外有人在研究东亚的地区主义时提到，东亚地区曾经有三个传统的体系：一是儒家体系，二是“门户开放政策”，三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并把它们定性为“强加的地区主义”典型。<sup>④</sup>此外，不少著述在讨论地区主义的功能时也经常回顾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分裂为以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互相排斥的集团的历史，并显然采取了“以史为鉴”的认识态度，这说明地区主义至少在那时候就发生了。对地区主义起始时间的这种意见不一本身或许毫无意义，只有把这种意见不一与下面即将谈到的规范思考联系起来才有价值。换言之，对起始时间的判断取决于规范研究中对地区和地区主义的定义方式，同时又有助于判定地区主义的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的不同性质。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国际研究中大量相关文献的关注重

- ① 李琼：《论经济地区化》，载《太平洋学报》，1999 年第 2 期。
- ② Louise Fawcett, “Region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7, p.10.
- ③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 3, Summer 1999.
- ④ Roy Kim and Hilary Conroy, *New Tides in the Pacific: Pacific Basin Cooperation and the Big Four* (Japan, PRC, USA, USSR) (1987), “Preface”, Quoted from Norman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91, p.45.

心。英国学者佛西特在谈到该问题时指出，新地区主义的根源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冷战的终结、世界上的经济变革、“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的结束、民主化或政治自由化的发展。<sup>①</sup> 怀特瓦尔特也提出了类似的四大因素：冷战的终结、世界经济力量的变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世界贸易中非关税壁垒的日益重要性等。<sup>②</sup> 他们这种分析的主要方面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在中国，学者们主要从生产力和技术革命上找根源，认为促成经济地区化的根本原因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一样，都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高度发展致使经济活动大大超越国界；但由于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等原因，使得各国首先趋于与本地地区的邻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某种一体化合作协议，组建地区经济组织；同时，面对日益激化的国际经济竞争，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被迫联合起来，以求相互间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而且能够以一个地区组织的资格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更有利的国际地位；另外，西方大国为争取在所在地域的主导作用，增强扩张力量而倾向于建立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sup>③</sup> 也有人重点提到地区主义的发展乃是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面临重重挫折时世界各国、各地区退而求其次的结果。但对后一种观点很快又有人予以驳斥，认为“这种观点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对地区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作了似是而非，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解释”，而形成地区一体化的主导因素仍只是“市场自身发展规

① Louise Fawcett, “Region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7, pp.17~30.

② Andrew Wyatt-Walter, “Reg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Economic Order”, in Fawcett and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7, pp.92~97.

③ 李琼：《论经济地区化》载《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